

“埃及人”的身份困境：罗马治下的身份变迁与社会偏见

高悦涵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长期以来, 学者在讨论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人时, 往往将他们笼统地归结为地方诺姆的埃及土著居民。这种简化掩盖了“埃及人”身份的多重面向。本文通过分析罗马埃及行省中“埃及人”法律身份的演变, 结合血缘、文化与等级身份的交叉差异, 考察了“埃及人”身份在不同阶层间的浮动, 并探讨造成这一差异的社会因素。文章旨在挑战对“埃及人”身份的单一化界定, 揭示其身份的多元性与流动性, 并强调历史语境与社会偏见对身份认同的深刻塑造。

关键词: 罗马帝国; 埃及行省; 身份认同; 埃及人

基金项目: “罗马帝国埃及行省治理模式研究” (21BSS047)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37

引言

长期以来, 在讨论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时, 人们习惯于将“埃及人”(Egyptians)简单等同于居住在地方诺姆(Nome, 即“州”)、从事农业生产且承担沉重赋税的本地居民。他们没有罗马公民权, 也被排除在亚历山大等“埃及希腊城市”的公民权之外。然而, 这种看似清晰的界定掩盖了“埃及人”身份的复杂面向。在希腊—罗马社会长期持有的偏见之下, “埃及人”一语远非一个单纯的法律或地域标签, 而是法律身份、血缘身份、文化身份与等级身份相互交织的产物, 无法用单一标准加以固定。

要追问“谁是‘埃及人’”, 就必须审视这一身份在时间中的演变轨迹及其界定上的困难。从法老时代颇为淡薄的民族意识, 到托勒密王朝刻意区隔的“希腊人”与“埃及人”两种法律身份, “埃及人”逐渐带上了歧视色彩, 成为叛乱者或底层群体的代称。与此同时, 血缘与文化的混合又不断模糊着这种区隔: 一个改用希腊姓名、成为骑兵的埃及人, 便可以拥有双重的法律身份和文化认同。罗马吞并埃及后, 在旧有的分类之上又叠加了“罗马人”这一新法律身份, 原有的“希腊人”被统摄进更宽泛的“埃及人”范畴。于是, 罗马官方视野中的“埃及人”既包括享有免纳人头税特权的亚历山大城公民, 也包括散居乡野的普通农民; 而亚历山大大人自身却拒绝与后者共享同一个称呼, 认为只有那些没有希腊文化背景、不具公民资格的人才是“真正的埃及人”。至于地方诺姆的精英, 他们的血缘和文化习惯与埃及农民相近, 却在法律地位上被罗马人看作“特殊的埃及人”, 甚至有机会跻身罗马公民行列。这种来自不同视角的认知错位, 使“埃及人”身份愈加模糊不清。

造成上述界定困境的深层原因, 在于希腊—罗马社会上层对“埃及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刻板印象。从希腊戏剧中的讥讽, 到罗马文学中的鄙夷, 再到书信中日常化的侮辱, “埃及人”被反复塑造成狡猾、无礼、不守法纪的底层形象。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法律身份与文明等级被紧密捆绑: 亚历山大城公民强调文化上的希腊属性以撇清自己与“埃及人”的关联, 罗马官员则把乡村逃亡农民视为“真正的埃及人”而加以驱逐。可见, “埃及人”绝非一个边界分明的群体, 它可以是一种法律身份, 一种等级身份, 一种文化身份, 甚至一种血缘身份, 其含义随语境和评价者的立场而变动。无视这种多元性和灵活性, 便无法理解罗马治下埃及社会的真实生态, 也无法看清在偏见与融合并存的进程中, 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如何在帝国后期逐渐萌生。

一、“谁是‘埃及人’?”——埃及身份的演变与界定难题

作者简介: 高悦涵 (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

通讯作者: 高悦涵

要真正理解“埃及人”这一身份的复杂性，首先必须将法律身份、血缘身份与文化身份这三个层面加以区分。三者虽有交叉，却并不完全重合，其间的落差恰恰构成了身份认同中最难以厘清的地带。依据埃及行省的重要法规《皇帝特殊账目指南》（*The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的规定，一名罗马男子若在不知晓女方身份背景的情况下与埃及女子结合，其所生子女可以承袭父亲的罗马公民身份；然而，若他明知对方是埃及人仍选择与之成婚，子女的法律身份则被归入“埃及人”之列。这意味着，经过短短两代人的混合通婚，一个家庭的后代可能在法律上被界定为埃及人，在血缘上却携带着罗马祖先的血统，而在文化认同上更可能同时受到埃及本土传统、希腊化风尚以及罗马生活方式的多重熏染。面对如此错综的交叠，任何试图凭借单一标准——无论是法律条文、血统谱系还是文化归属——来判定“谁是埃及人”的做法，都注定陷入困境。事实上，这种困境并非罗马统治时期所独有，它的根源深埋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

（一）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埃及人”身份

在更为遥远的法老时代，埃及作为尼罗河谷的强盛王国，其民众对所谓“民族身份”的意识相当淡薄。彼时的普遍观念是：凡在尼罗河水浇灌的土地上生长的人，便是埃及人。至于努比亚人、利比亚人、亚细亚人等周边族群，尽管与埃及人往来频繁，却至多被视为“外乡人”或遭逢战败的敌人，埃及人并未对他们抱持后世所常见的那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敌视或排斥。这种相对包容的身份观，与法老埃及长期处于区域强权的地位密切相关——当一种文明自信于自身的优势地位时，往往无需通过刻意抬高身份门槛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

然而，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以及随之而来的希腊—马其顿移民浪潮，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一古老的身份格局。托勒密王朝建立后，为了确保希腊—马其顿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开始在法律上有意识地划分“希腊人”与“埃及人”两大类，并以制度手段使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在这一时期，“埃及人”的称谓开始沾染上明显的歧视意味。公元3世纪后期，一位名叫赫拉克拉底斯（*Herakleides*）的希腊人在写给当地诺姆将军（*Strategos*）的投诉信中愤然指责：“不要无视那个埃及女人对我这个希腊人的无端侮辱！”这句话的语气清楚地显示，在他的认知中，“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已经横亘着一道等级化的鸿沟，以至于一个埃及妇女对希腊人的冒犯，被视为某种阶层上的逾矩。不仅如此，托勒密官方的政治话语也惯于将“埃及人”与“叛乱分子”联系在一起。公元前2世纪末，塞琉古王国与托勒密王朝再度兵戎相见之际，大臣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在亚历山大城起事，官方文书便斥责他“煽动埃及人叛乱”——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埃及臣民并未参与其中，依然对王朝效忠。

在这样一种结构性偏见的持续作用下，埃及人对希腊人的敌意也悄然滋长。一位希腊隐士曾诉苦称，自己仅仅因为是希腊人，便在神庙中遭到埃及人的暴力对待。然而，倘若因此就将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关系想象为界限森严、水火不容的对立，则又失之于简略。一份流传至今的诺姆档案记录了一名士兵的晋升轨迹：此人原本拥有一个典型的埃及名字，却选择将其弃用，改用一个全新的希腊姓名，并由此进入国王的骑兵部队服役。这一案例至少包含两重启示：其一，纸草文献中屡见不鲜的“马其顿士兵阶层”（*Katoikoi*），绝非清一色的希腊—马其顿定居者后裔，埃及血统者同样可以跻身其间；其二，希腊身份与埃及身份之间的界限远非现代研究者有时设想的那般绝对。正如学者所恰当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区分”。在托勒密王朝的现实中，一个人完全可以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同时拥有双重的文化认同、双重的血统归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双重身份。

（二）罗马兼并后的“埃及人”身份

公元前30年，罗马兼并埃及，将其纳入行省体系，这一政治剧变带来了身份分类框架的重新洗牌。罗马统治者在托勒密王朝原有的“希腊人”与“埃及人”两种法律身份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希腊人”这一旧有法律类别被取消，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身份层级存在；另一方面，则新增了“罗马人”（即拥有罗马公民权者）这一更具特权色彩的法律身份。由此造成的后果颇具悖论意味——托勒密时代分属两个法律类别的“埃及人”与“希腊人”，在罗马的新分类体系中被一并归入了广义的“埃及人”范畴。换言之，一个曾经以“希腊人”身份自居的亚历山大城公民，在罗马官方的法律视野中，与尼罗河畔耕种的农民同属“埃及人”。当然，正如托勒密时期那位通过改名换姓从“埃及人”跃升为“希腊人”的士兵所昭示的那样，“埃及人”的法律身份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埃及成为行省之后，外来移民的流入基本趋于停滞，此后出现的罗马公民，大多是通过服满兵役、个人恩赐或特许等方式获得公民权的本地居民及其后代。

然而，法律条文的统一分类，并不等于社会现实的无差别处理。在那些被现代学者冠以“埃及希腊城市”之名的特殊共同体中——亚历山大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其公民虽然被罗马官方视作广义的“埃及人”，但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地位却与普通埃及人判若云泥，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特权便是免缴人头税。这一微妙的差异在当

时已被敏锐地察觉。曾为自己的医生谋求罗马公民权的小普林尼，在书信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困惑：“更有经验的人提醒我，最好先替他取得亚历山大城公民权，然后再申请罗马公民权，因为他是一个埃及人。”这段文字意味深长：它一方面说明在罗马统治阶层的认知中，亚历山大城公民终究还是“埃及人”；另一方面又表明，这种“埃及人”身份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梯度，亚历山大城的公民权可以被视为通往罗马公民权的一块垫脚石。与此形成呼应的，是这些“特殊埃及人”自身的态度。尽管被罗马官方笼统地归入“埃及人”行列，亚历山大城的居民在心理上却极力与此保持距离——在他们的日常话语中，“埃及人”一词依然承载着托勒密时代延续下来的轻蔑意味。公元1世纪，当“犹太人能否免缴人头税”成为亚历山大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时，该城的伊西多罗斯(Isidorus)在公众场合宣称：“(犹太人)和我们不是一类人，他们更接近埃及人，难道不应该和那些缴纳人头税的人处于同一水平吗？”据文献记载，此语一出，当场获得了不少亚历山大市民的附和。在这里，“埃及人”不仅是法律标签，更是一种用以区隔“我们”与“他们”、文明与粗鄙的符号武器。

罗马史家约瑟夫斯曾以一句极为简洁的判断概括了这种普遍印象：“‘埃及人’没有公民权利，法律地位低下。”由此衍生出一种颇为流行的界定思路：以“是否参与地方自治”与“是否缴纳人头税”等具体权利标准来圈定“埃及人”的外延。依此标准，亚历山大的特权公民自然被排除在“埃及人”范畴之外，而广大的乡村农民则被清晰地划入其中。然而，这一看似明晰的标准，在面对地方诺姆的精英阶层时却暴露出严重的局限。诺姆精英在罗马官方的法律分类中同样属于“埃及人”，他们并非亚历山大等希腊城市的公民，必须承担缴纳人头税的义务；同时，由于罗马人全盘继承了希腊人关于“埃及人无法无天，不适合公民生活”的古老偏见，这些地方精英同样被排斥在地方自治的大门之外。然而，倘若据此便认为他们与普通埃及农民处于同一社会层级，则大错特错。正如罗马当局自身所意识到的那样，诺姆精英“仅在血缘和习惯(包括家庭结构与继承方式)上与埃及人基本相似”，他们拥有的财富、影响力以及希腊化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罗马官员眼中远非普通的“埃及人”可比。这些表面的身份限制，并未对他们构成实质性障碍——他们依然可以较为顺利地转化为实际上的“特殊埃及人”，甚至最终为自己或后代争取到罗马公民权。

总而言之，在罗马官方的认知框架中，“埃及人”首先是一个涵盖整个行省居民的法律范畴，尽管其内部存在“特殊的埃及人”(如亚历山大城公民)与“普通的埃及人”(如乡间的农民)之间的区分。而在亚历山大城公民的视角下，“埃及人”的内涵则远不限于法律身份的界定，它还深刻地牵涉到血缘谱系与文化素养的考量：在他们看来，唯有那些既不具有希腊城市公民资格、又缺乏希腊文化熏陶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埃及人”。至于地方诺姆的精英阶层，他们在血缘和文化归属上或许认同自己与埃及土地的关联，但其实际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处境却远远凌驾于一般埃及民众之上，被罗马统治者视为某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埃及人”。这三种视角彼此交错、互不相容，使“埃及人”这一称谓的所指始终处于流动与争议之中，其身份的模糊性也因此深深嵌入罗马埃及的社会肌理之中。

二、“困难的根源”——围绕“埃及人”的刻板印象

“埃及人”身份之所以长期难以界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希腊—罗马社会中上层对该身份所怀有的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在这些人所构建的想象图景中，“埃及人”的形象被刻意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社会类型：即那些终日在尼罗河畔的泥泞中劳作、从事农业生产、承担沉重赋税的底层农民。正是由于这一固化的刻板印象，不同群体才发展出各自的身份策略：罗马统治者需要刻意区分“特殊的埃及人”与“普通的埃及人”，以免享有特权的希腊城市公民与服务于帝国的精英被笼统归入他们自己所鄙夷的范畴；亚历山大城的公民则断然拒绝仅凭法律身份便被称作“埃及人”，因为他们心中的那个称谓满载着粗鄙与不文明的联想；甚至那些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埃及土地紧密相连的诺姆精英，也由于这种偏见的弥漫，被罗马当局视为某种需要另行归类的“特殊的埃及人”，仿佛“埃及人”这三个字天然地不足以涵盖他们的体面与地位。要理解这一系列身份界定的困境，就必须回到塑造这些刻板印象的具体历史和文本现场中去。

(一) 古典文学中的埃及刻板印象

对埃及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最早可追溯至希腊古典文学。在希腊作家的笔下，埃及人逐渐被类型化为一群“狡猾、无礼、好偷盗”的人，这一形象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中已屡见不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语中曾出现一个专门的动词“Aigyptiazein”，其字面意思为“像埃及人那样行事”，而在实际使用中则暗含着欺诈、鬼祟等贬损意味。一个动词能够被创造出来并进入日常语言流通，本身就说明对埃及人的轻蔑绝非仅仅停留在戏剧舞台的插科打诨之中，而是已经渗透进雅典市民的口语与思维惯性。这是一种比文学虚构更令人不安的事实：如果说戏剧中的嘲弄尚被视为艺术夸张，那么一个专门用来描述“埃及式行径”的动词，则宣告这种偏见已经被编织进了语言本身的肌理之中。

托勒密王朝建立后，希腊人作为统治阶层定居于埃及本土，与埃及人比邻而居，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并未消解原有的偏见，反而由于殖民统治的内在需要而进一步强化了它。统治集团需要维持一种心理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而贬低被统治者的形象正是维系这种优越感的重要手段。诗人西奥克里特（Theocritus）的作品为这种心态提供了极佳的注脚。他曾以讥讽的口吻记录下当时希腊人对埃及人的流行看法：“（希腊人说）如今，没有哪个罪犯会像埃及人那样鬼鬼祟祟地伤害路人……那些游手好闲的埃及人热衷各种邪恶的游戏，比如合伙欺骗某人。”在这段话中，埃及人不仅被描绘成罪犯，而且被放在了罪犯序列中最卑劣的位置——他们不是凭借力量或胆量作恶，而是以偷偷摸摸、成群结伙的方式行事，这与希腊人自我标榜的“光明正大”的公民品格形成了刻意对照。与此同时，西奥克里特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埃及希腊人社群内部的微妙心态。他塑造了一个名叫普拉克西诺亚（Praxinoa）的角色，这位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女子热衷于向其他希腊人炫耀自己流利的多利安方言和古老的科林斯血统，甚至自比为“希腊英雄珀尔修斯（Perseus）的后裔”。这一文学形象之所以意味深长，是因为它揭示出：即便在已经享有特权地位的埃及希腊人中，身份的焦虑也从未真正消散。他们需要不断借助语言、血统叙事乃至神话谱系来加固自己与“真正的希腊人”之间的纽带，仿佛稍一松懈，就可能滑向他们自己所鄙夷的“埃及人”行列。这种焦虑越是强烈，就越是反证了“埃及人”这一身份标签在当时社会中所承载的沉重污名。

当希腊化世界为罗马所征服，希腊文学中关于埃及人的刻板印象并未随之消散，而是被罗马作家几乎全盘继承，甚至以更具系统性的方式加以深化。塔西佗在《历史》中曾以一句极具浓缩力的判断来概括整个埃及行省：“一个交通不便、盛产谷物、因迷信和放纵而宗派林立、混乱无序、不懂法律、蔑视长官的省份。”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定语都值得仔细审视：所谓“交通不便”，暗示的是埃及远离文明中心的地缘劣势；“盛产谷物”看似中性，实则帝国语境中暗含着埃及作为粮仓的工具性角色——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供给，而非在文明序列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迷信”“放纵”“宗派林立”“混乱无序”“不懂法律”“蔑视长官”这一连串密集的指控，则从信仰、道德、政治秩序到法律意识，对埃及进行了全方位的贬损。在塔西佗的修辞中，埃及与其说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行省，不如说是一面哈哈镜，映照出罗马帝国所自我定义的秩序、理性与法度的反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罗马社会中流行的一句俗语：“吕底亚人的邪恶位列倒数第二，埃及人的邪恶倒数第一。”在罗马人眼中，被征服民族各有各的缺陷，但埃及人在这一道德排序中被固定在了最底端。换言之，在罗马文学所塑造的帝国想象中，埃及人不仅是“一个”被歧视的对象，而且是歧视链条的终点，是所有负面品质的集大成者。

（二）文书资料中的埃及刻板印象

如果说文学文本中的刻板印象尚有可能被解释为修辞惯性或艺术夸张，那么大量流传至今的书信与官方文书则有力地证明：这些偏见绝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空洞套话，而是活生生地渗透进了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与权力运作。在实际的社会互动中，“埃及人”的标签常常作为一种贬低对方的武器被反复使用，其效果之直接，远非文学形象的潜移默化所能比拟。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公元2世纪后期的一封“罗马老兵请愿书”。其作者盖乌斯·尤利乌斯·尼格尔（Gaius Julius Niger）拥有多重身份：他是一名罗马高卢军团的老兵，同时也是埃及安提诺普利斯（Antinoopolis）——埃及仅有的四个希腊城市之一——的公民。尼格尔在一桩橄榄园所有权纠纷中与一位地方官员发生冲突，后者依法行使职权，拔掉了他插在园中主张所有权的标签。这本是一起普通的执法行为，但尼格尔在致行政长官的请愿书中却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我竟遭到一个埃及人的侮辱！……一个罗马人居然在一个埃及人手里忍受这样的折磨！”在这段文字中，纠纷的事实本身——谁真正拥有橄榄园的所有权——几乎被搁置不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对立叙事：一方是“罗马人”，另一方是“埃及人”；前者天然应当受到尊重，后者天然不配对前者行使任何权力。尼格尔显然深谙这套话语的运作规则：他并非仅仅在控告一次不利的执法裁决，而是在诉诸一个更大的、为帝国统治阶层所共享的价值预设——一个“埃及人”竟敢执法到一个“罗马人”的头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秩序颠倒。在这个意义上，“埃及人”标签所承载的偏见已经深刻地嵌入了罗马埃及的法律实践和权力结构之中，成为弱势一方——哪怕他是依法行事的官员——无力反驳的身份原罪。

另一封同样来自纸草文献的书信也呈现出类似的心态，但角度略有不同。寄信人阿莫尼奥斯（Ammonius）在写给友人朱利叶斯（Julius）和希拉罗斯（Hilarus）的信中，以一种几乎是“提前辩解”的语气写道：“朋友们，你们或许会认为我是个野蛮人，或是一个不人道的埃及人，但我向你们保证绝非如此……”阿莫尼奥斯的措辞之所以值得细读，是因为他所做的并非在回应一个已经提出的指控，而是预先想象自己可能在对方眼中被归入“野蛮人”或“不人道的埃及人”这一范畴，并抢先予以否认。这一细节表明，“埃及人”的刻板印象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与此标签有关联的人不得不时刻警惕它的阴影，甚至在并无具体质疑的情况下也要主动与其划清界限。偏见一旦内化到被偏见所针对的群体自身，其影响力便远比施加偏见的主动侮

辱更为深远而持久。

而在另一封由亚历山大城公民赫拉克拉斯 (Heraclas) 写给他的养子阿凯劳斯 (Archelaus) 的信中, 偏见则以一种更为粗暴和工具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赫拉克拉斯在信中要求对方派遣一名沙漠卫兵并附上逮捕令, 去抓捕一个名叫拉斯塔斯 (Lastas) 的人, 理由是该人对他“施暴”。然而, 在陈述这番请求之后, 赫拉克拉斯补上了一句颇具意味的话: “你知道埃及人都是些什么货色!” 这句话的修辞功能远不止于一句简单的抱怨。它暗示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 对于像阿凯劳斯这样的收信人而言, “埃及人是什么货色”根本无需解释, 因为答案已经在他们共享的文化偏见中被预先给定。最意味的是, 写信人赫拉克拉斯自己在罗马官方的法律分类中同样属于“埃及人”——他是亚历山大城公民, 是“特殊的埃及人”, 但他却毫不迟疑地使用“埃及人”这一标签来贬低另一个在法律上与他同类的诺姆居民。在这里, 同一法律身份内部的裂痕被放大到了几乎不可弥合的程度: 赫拉克拉斯通过将拉斯塔斯归入他所鄙夷的那个“埃及人”范畴, 实际上也在无声地宣告自己不属于那个世界。这一案例为我们理解“埃及人”身份的界定困境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因为就连“埃及人”本身, 也拒绝承认另一些“埃及人”与自己同属一类。

除上述民间文书所呈现的视角之外, 官方文献同样为这一偏见提供了权威性的佐证。罗马皇帝卡拉卡拉致亚历山大城居民的那封著名信件, 集中展示了帝国最高统治者本人如何看待“埃及人”问题。卡拉卡拉在信中下令, 将那些从农村逃往亚历山大城的埃及人驱逐出境。他给出的理由是: “埃及人不想从事农业劳动……他们人数众多, 不务正业, 给城市带来了麻烦。”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皇帝随后补充了一项据称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别标准: “埃及人很容易辨认……他们的生活习惯不符合文明社会, 暴露了他们乡巴佬的出身。”寥寥数语, 帝国权力的傲慢与对底层埃及人的刻板想象展露无遗。在卡拉卡拉的口吻中, 真正的埃及人被描述为一种本质上属于乡村的生物, 他们的身体和生活习惯都打上了无法磨灭的“乡巴佬”烙印, 以至于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可以凭肉眼将他们从文明的城市人群中甄别出来。然而, 即便在这封充斥着居高临下的鄙夷的信件中, 卡拉卡拉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他特意补充了一条保留条款: 那些“进城参观的埃及人”或“为亚历山大城提供服务的埃及人”, 不应在驱逐之列。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附加说明, 恰恰最为直接地暴露了“埃及人”身份内涵的多元性。帝国的官方话语在同一个文本中同时处理了至少三种不同类型的“埃及人”: 第一种是皇帝下令驱逐的“逃亡农民”, 他们是刻板印象中那个不文明、不务正业的类型; 第二种是皇帝明确予以宽容的“为城市服务的埃及人”, 他们虽然也是“埃及人”, 却因为提供了某种有用的功能而获得了有限的容忍; 第三种则是没有在信中被直接点名、但始终作为对话对象而存在的亚历山大城公民——他们同样是法律意义上的“埃及人”, 却似乎完全悬置在这封关于“埃及人”的信件所针对的范围之外。正如文本所示, “埃及人”的含义绝非凝固的铁板一块, 它可以在卡拉卡拉的同一道谕令中同时指向驱逐的对象、宽容的对象, 以及那个始终在场的、不言自明的例外。

文学传统与日常生活实践共同编织了一张偏见之网, 使“埃及人”这一身份在帝国社会中被赋予了远远超出法律条文的额外负重。在这种偏见的支配下, “埃及人”不仅是一个分类标签, 更是一个可以随语境和说话者立场而伸缩的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武器。它可以在法律层面上指称所有非罗马公民的埃及行省居民, 可以在等级意义上被亚历山大人用来区隔那些“真正底层的埃及人”, 可以在血缘意义上被延伸至拥有埃及血统的罗马公民, 也可以被卡拉卡拉这样的最高权力者灵活地用于区分应被驱逐的、可被容忍的, 以及无需纳入讨论的各色人群。正因为这种多层次性与偏见的高度缠绕, “埃及人”的身份界定才变得异常困难。现代学者在审视这一问题时, 必须充分意识到古代社会偏见在建构和扭曲身份认同中的巨大作用, 并以此为前提来理解“埃及人”这一范畴所特有的流动性与语境依赖性。

结语

诚然, 希腊—罗马人对埃及人存在种种偏见, 但我们已经看到, 希腊—罗马身份与埃及身份并非截然对立。在埃及行省, 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都能在罗马帝国的框架下蓬勃发展, 并逐渐融入整个帝国的文化脉络。在这一趋势影响下, 到了帝国后期, 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也将在埃及行省生长起来。

综观罗马埃及的身份变迁, 对“埃及人”的界定始终徘徊于法律范畴、文化偏见与社会现实之间。行政律令虽然将绝大多数行省居民圈入“埃及人”这一宽泛的法律身份, 并以此作为征税和治理的凭据, 亚历山大城的公民、地方诺姆的精英乃至凭借军功或恩赐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普通埃及人, 却不断用各自的方式突破这种范畴的束缚。他们的经历表明, 身份并非凝固的烙印, 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文化习得、财富积累和帝国恩赐不断重新协商的社会资产。正是这种流动性, 使希腊—罗马精英所想象的那种单一的、固化的“埃及人”形象屡屡在现实面前松动。

那些书信与请愿中刻薄的言辞, 固然折射出深刻的歧视心理, 但歧视之所以被反复强调, 恰恰因为界线时常变得模糊。一位口操流利希腊语、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仍可能因其埃及血统而沾染“埃及人”的嫌疑; 而一位

出身诺姆的农民，在进入军队或为城市服务之后，其身份在官方和民间的话语中也会悄然变化。由此可见，偏见不仅未完全阻断融合，反而从反面印证了身份的多重性与可渗透性。

希腊—罗马文化与埃及本土传统在行省内的长期共存，为这种多重身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神庙与竞技场比邻而立，科普特语与希腊语在日常中并用，埃及的神祇被赋予希腊化的面容，希腊的文学也间或征引埃及的智慧。这些日常的文化实践逐渐消解着“希腊人/埃及人”的二元对立。进入帝国后期，随着罗马公民权的逐步扩展，法律意义上那种将大量居民统摄为一体的广义“埃及人”概念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罗马政治认同、希腊文化熏陶与埃及地方特性交织在一起的新身份认同。它既不再单纯以族裔或旧法律地位为唯一标准，也不再完全臣服于昔日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在帝国普遍公民权与地方文化复兴的共同作用下，孕育出晚期古代埃及独有的面貌。

因此，“埃及人”的身份困境，本质上是一场由权力、法律、文化与日常实践共同参演的漫长戏剧。对它的追溯提醒我们，身份从来不是可供简单归类的静态标签，而是历史语境中不断被建构、争夺和重塑的意义场域。

参考文献：

- [1] ROWLANDSON J. Dissing the Egyptians: legal,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Roman Egypt[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2013: 213-247.
- [2] BAINES J. Contextualizing Egyptian representations of society and ethnicity[M].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1996: 84.
- [3] CLARYSSE W. Greeks and Egyptians in the Ptolemaic army and administration[J]. *Aegyptus*, 1985, 65(1/2): 57-66.
- [4] CLARYSSE W, Johnson J. Some Greeks in Egypt[C]//Lif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Egypt from Cambyses to Constantine and beyond, Date: 1990/09/04-1990/09/08, Lo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1992: 51-56.
- [5] JONES K R, JONES K R. The figure of Apion in Josephus' "Contra Apionem"[J].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in the Persian,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 2005: 278-315.
- [6] HARKER A. Loyalty and dissidence in Roman Egypt: the case of the Acta Alexandrinorum[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35, 57-58.
- [7] Strabo, *Geog.* 17.1.12.
- [8] Tac., *Hist.* 1.11.1.
- [9] P.Oxy. XLII 3061.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he “Egyptians” : Identity Changes and Social Prejudices under Roman Rule

Gao Yueh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discussing Egyptians under Roman rule have tended to broadly categorize them as the indigenous Egyptian inhabitants of the local nomes. This oversimplification obscures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the “Egyptian” identity.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al status of “Egyptians” in Roman Egypt and considering the intersecting differences of descent, culture, and social hierarch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Egyptian” identity fluctuated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nd explores the social factors behind such differences. It aims to challenge monolithic definitions of the “Egyptian” identity, reveal its plurality and fluidity, and underscore how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cial prejudice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identity formation.

Keywords: Roman Empire; Roman Egypt; Identity; Egyptians